

■我的文学观

## 在文字世界里捡拾自己

□离 响(蒙古族)

我出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,九岁走出草原,随家人迁居河北承德,大学时来到海南,一晃数年,故乡已大变,我亦然。年少时一心想着世界广阔,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只有两条腿和一条人生路。活着活着,猛然间,在一个特定的阶段真切地迷茫起来,世界很大,我无限小,站在原地,四周都是路,却不知道往哪里抬脚。弄不清为什么就把自己困住了。于是,想表达自己。幸好,人类创造了文字,不用喊也能出声——八年前,我就这样从写作的路上出发了。

起初是写诗歌,以为诗歌短,好写。然后写小说,其实也不容易写。后来明白,于我而言,诗歌、小说、散文,写好都不容易。

我写的第一篇小说《婴儿姿势》在《草原》杂志发表,开始我有点儿不相信,因为我从没坚定地认为自己拥有当一个作家的才华。这篇小说的命运比较顺畅,也带给了我一些好运,让我获得了第二届草原文学类小说提名奖。这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要给一个草原孩子的幸运。每每想起,我都宿命般地认为是这篇小说的运气很好。

真正进入写作行业后,我才发现有一个写作的海洋在眼前,我不会游泳,若贸然进去扑腾,弄不好会把自己“溺死”。幸好,因为我写作时很认真,有机会得到专业的培养和指导,在海南省作协的推荐下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,见到了很多大名鼎鼎的作家,与真实的文学世界近距离接触,在各方面都有感触和收获。

大部分时间里,我处于从文学的概念里抽离出来的状态中,然而,心里始终有故事在生长,觉得我还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,但我缺少必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标准,只是尽量随心自在地用心写作。我是众生中的一个人,我的困惑也是大多数人的困惑,而写作是一个非常省力的抒发渠道。我还没写出有艺术感的作品,但我正在努力把自己活得有艺术感。大多数时候,我要把雕刻的刀尖转过来对着自己,也正因为如此,会不断产生不同维度的困惑和迷茫,就更加想要深入地面对、探索自我的真相。

我曾跟朋友说,我对自己更刻薄。我经常把自己内心最隐晦的部分都拿出来检视一番,整个心魂都有机会被晾晒,这让我自身产生了很多惊喜的改变。我想,这是一个作家的一种能不怨天尤人的勇敢。

“人啊,认识你自己。”这句话真够狠的,不到一定年纪根本无法体会它在说什么,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就该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困住了。

我解困了吗?没有。

只是,我不求解困了,就在自己所立足的困

境中活下去。

有时候,我觉得自己完全散了,在理智和情绪的海洋里沉浮,无处诉说。幸好,还可以翻一本书,躲进文字里求得一时的安宁以及重新回到生活中的力量。这样一时一时的累加,内心慢慢地丰盈起来,灵魂散落的部分也逐渐被收回到自己身上。

有一年里,我重复翻阅《沉思录》,现在已不记得里面的文字。后来,我喜欢上了法国史学家儒勒·米什莱,买了他的散文集《大自然的灵魄》来读,结果只认真读了他的《女巫》,读懂了一半。我被书名迷住了,把微信签名都改成“独自在荒野跳舞的女巫”。

一个朋友说:“你躺在床上还在琢磨的事就是你的天赋所在。”

听了这句话,我心里一亮。我躺在床上翻书、思考、想未完成的故事,有些故事永远不会变成文字,但它们在我大脑里丰富而精彩。这世界上的物质是有数的,一个人能占有的物质更是有数,但脑海里的世界真的可以无限丰富,丰富到语言无法形容。

我的生活很简单,但不单调。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成了一个手冲咖啡师,这期间多数时候在端咖啡、洗杯子、试喝咖啡,而今基本能喝出不同产区、不同级别、不同风味的豆种了。这是一件技术活,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快乐。这个过程中,我读了很多咖啡行业的专业书籍,在书里遇到了很多咖啡行业里很有魅力的人,有些是古人了。

由于童年在草原上度过,山野能给我天然的自由和喜悦感。如今,虽然在城市里生活多年,我依然喜欢到山野中行走,有时会特意开车穿过田间小路,沉溺于田园鲜活的安静中。我见过海南岛最好的马、最大的鳄鱼、雨林中正在腐烂的巨大陆均松……

真实的生活体验让我更加热爱阅读和写作。这两年,受到孩子们和海洋文学的影响,我喜欢上了看自然纪录片,关于海洋的作品比重很大。我还花时间读了海洋科幻小说《群》,惊叹于印第安人的谚语“万宗归一”跟中国传统文

化、武侠文化精神内核的异曲同工。

我有一点领悟:一篇小说的命运齿轮在作者写完之后才真正转动起来。有时,作者写作的初衷并非是为了读者,而是源于内心的情感或自我表达。一旦完成,小说便脱离了作者的掌控,在精神上独立存在。之后,读者的喜恶与解读,已与作者无关。至于说一部作品被作者完成了,而只有作者知道,无缘于读者,那也是这篇小说的命运。



离响,1983年生于内蒙古,蒙古族。作品见于《草原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散文》《绿风》《鸭绿江》《黄河文学》等。获第二届草原文学奖小说提名奖、海南省民族文化“七个一”长篇小说特等奖、海南文艺奖等。



一位投资领域的朋友说在股票市场上存在错误的共识现象。道理可以通用,在文学里也会存在错误的共识,畅销的作品不一定符合恒常大道,沉默的或者是恰好被忽略的那部分作品中也存在着精品的或然性,所以,一个人无法跟上流行或不能全然认同流行也不必太慌张。

真诚地面对真实的自己需要勇敢,写作让我把这样的勇敢认出来,并在自己的身上一次次试验,通向真实自我的路充满了荆棘,走通了就可以见到光明。

时代飞速奔驰,人类善于怀旧,但“从前”不可能比现在更好。虽然很多人喜欢看穿越剧,但谁愿意真正亲自穿越回去呢?我更喜欢穿衬衫和短裤走在绿树成荫的南国街巷中,使用手中的智能通讯工具呼唤朋友,而不愿到山洞里修仙。

司汤达说:我活过,爱过,写过。

我说:我也一样。

最后,我想说一件美好的事。在2025年夏季,我爱上了自己鬓角的三根白发,最初是三根,现在或许多了。白发是利滚利的复利产品,而且是时光女神禁止转送的粗暴赠予,我回馈给这份厚礼的是坦然而柔和地接纳。它们银白,在我油黑的发中如挑染一般鲜活。我开始想象自己有一头银白的发,不要太短,一颗纯粹又勇敢的心,不要躁动。也可以经常暗暗自洽:我的人生还挺有味道的。

## ■编辑手记

我喜欢这个地方,它有时候迎着熹微,有时候伴着落日。从我这里抬眼望去,斑驳但还算洁白的墙壁上挂着我业余时间画的油画,电脑前方的几支绿竹枝叶舒展,桌子和桌子下,摆放着一摞摞文学杂志,旁边的窗台上堆着刚看完的稿子,身旁的书柜里,校对完的往期大样被我分装在一个个牛皮纸袋里,它们似乎沉默不语,又似乎蓄势待发。我知道,在无声中,它们都是不同的面孔和不同的生命。每当终校完毕,我都长舒一口气,仿佛农民面对收获时般喜悦舒畅。

我说的这个地方,是《满族文学》的编辑部,而我,是这里的一名编辑。

《满族文学》创刊快有50年了,它是由辽宁省作协和丹东市文联共同主办的刊物。这是一本足够坚韧的纯文学刊物。几十年来,刊物历经10任主编,得到了一大批满族作家的支持和厚爱。他们当中有许多位,先后成为刊物的顾问。

无数个日夜,我会被来稿中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作者们所感动,他们是“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”,他们为生活奔波之余,心里还亮着一盏文学的灯火,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文学,很难带来世俗中的利益,但仍有人热爱它。我很幸运,能从事自己热爱的文字工作,尤其幸运的是,还有那么多的老师们在关心刊物,那么多的作者在支持刊物。

我还清晰地记得2023年初春的一天,我突然接到小说家于晓威的电话,彼时正是我调到《满族文学》做主编的第三个年头。他在电话里跟我沟通一件事情。他告诉我,老作家舒群先生的中篇小说《满洲的雪》,刚刚被发现了抗战时期最早的版本,经黑龙江大学付立松副教授倾心整理和重校,准备交由《满族文学》发表,问我是否可以。

众所周知,舒群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一员,也是“左联”的骨干成员。《满洲的雪》是舒群定稿于1938年的中篇小说,取材于作者早年经历,讲述了抗日义勇军战士雨文引导汉奸之女朱琳投身抗战的传奇故事。小说曾连载于1939年3月9日至5月20日《申报》(香港版)第八版。后来却一度消失,各方遍寻不得,仅存于文学史篇目存录中,成为舒群研究一大缺憾。舒群古稀之年自编文集,也遗憾未能找到并收录《满洲的雪》。

“我很早就知道舒群写过这部《满洲的雪》,别人的回忆文章里有提到过,可我从未读过原文。这真是‘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’。”于晓威兴奋不已地说:“李雷明先生一直关注《满族文学》,经过郑重考虑,他想授权将这部从未在刊物发表过的小说交由我刊推出。李雷明先生还说,国内众多刊物中,他觉得由《满族文学》来发表这部小说最为合适。”

大家信任如斯,我自不可辜负,理应格外重视。

2023年正值舒群诞辰110周年之际,我们经过紧密策划,在当年第4期推出“纪念舒群110周年诞辰”专栏,使这部消失了80多年的文本得以重现文坛。为了给文坛提供更好的资料,专栏还配发了付立松副教授《关于重新发现舒群〈满洲的雪〉的说明》,以及研究此小说的三篇评论。专栏推出后,收获了诸多关注。《辽宁日报》为此专门派记者做了专访,并采写了深度报道《故乡的雪总有一半是红的》。该报道在《辽宁日报》刊出后被众多网站转载。

作为《满族文学》的编辑,我们也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

看稿疲倦之余,我喜欢站在窗边,极目远眺。北面的锦江山,起伏错落;南面的鸭绿江,波平如练……丹东,作为全国最大的边城,与朝鲜隔江相望,有满族、朝鲜族、锡伯族、回族、蒙古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。其中,满族人口最多,占当地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2%。在历任主编的努力下,《满族文学》数十年来培养和团结了一批丹东本土的少数民族作家。

《满族文学》不仅是本土满族作家的“娘家”,也是全国满族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。

格致是我约稿最多的满族作家。虽然我与她从未谋面,对她的个人生活知之甚少,但我熟悉她文章中的每一个脉络,抚摸过她文字中的每一处褶皱。文字之交最是纯粹,这是独属于编辑的秘密,也是独属于编辑的快乐。格致在《满族文学》发表过一系列富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散文。如《皇帝的乡愁》系列中,她以轻松的笔调描绘了康熙吃的进贡松子的由来,也写白雪皑皑中,从吉林乌拉到北京的康熙盛世的御道上庞大的进贡车队的艰难前行。《西厢记》则是格致搬到吉林乌拉街满族镇后所写,在满族聚居地生活,格致的民族情结得到了更深的扩展,读者也由此深入了解了满族文学的独特风貌。

绿窗是我做主编后新结识的满族作家,她的散文有鲜明的个人印记,语言简洁,但耐人寻味。2022年,我编发了她的散文《戏文》,颇具地方特色。2023年,我又编发了她的散文《废墟之鸟》。她写得很慢,作品不多。前几天,她又将她新写的一篇万字散文发给我。这是她对我的信任。

尽管名为“满族文学”,但《满族文学》从创刊伊始就是一本兼容并蓄的刊物,不仅发表满族作家作品,也对汉族作家葆有深深的敬意,发表了大量汉族作家的优秀作品,民族团结的面貌在我们的刊物上有着生动的展现。

“80后”朝鲜族作家邹金红原是网络作家,她善于观察,网络小说写得细腻生动。与她结识后,她在我们的影响下慢慢转到了纯文学创作。《满族文学》发表了她的小说《阅后付丙》,尽管在叙述上仍有网络文学的影子,但她的天赋很快就弥补了这一不足。作为一名美术教师,她课业负担比较重,写作时间较少,我就经常打电话督促她、鼓励她。她经常分不清汉语里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的使用,令编辑很是头疼。她有一次跟我聊天时说,于晓威老师编完她的稿子后告诉她,单是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,就给她改了一下午。

前一阵儿,邹金红被推荐参加在朝阳举办的民族作家培训班,我正好被邀请去给学员改稿,她带去了一部近4万字的中篇小说《小宅门》,依旧是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分不清楚。我找了一个空闲时间,专门教她区分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。

“这次,我终于学会了。相信我,再也不会用错了。”她说。

窗外的天色漫上浅浅的一层暗影,一缕柔光覆上桌面摊开的校样,黑色的字句染上了暖融融的亮色。晚风吹动翠竹的长叶,发出哒哒的默响,又悄悄落在纸页上,像是为这期即将付梓的新刊,轻轻添上一笔温柔的句号。

不是我温暖了它,是它在温暖着我。

(作者系《满族文学》主编)

## 编辑部里的温暖

□王雪菡

## 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时代生活

□艾诺依(回族)



进步带来的生活变化,更关注人在技术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价值追寻。在钢铁丛林与数据洪流之间,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寄托,一种在高度理性与机械化中依然保留人性温度的可能。

文学从来不是技术的附庸,而是思想的灯塔。它不仅要展现技术的进步,更要叩问技术背后的意义。当然,文学创作,不应只是个体的独白,而应是民族、文明与社会的共鸣,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思考自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走向。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去审视文学,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价值,才能写出具有历史纵深感与现实穿透力的作品。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时代洪流中的浪花,他们虽然看似渺小,但正是这些“小人物”的点滴努力汇聚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。

我曾多次行走于中国的陆地边境线,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新疆的帕米尔高原,从内蒙古的草原到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,从原始的热带雨林到沙漠戈壁雪原,亲身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。这些地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,更是文化、民族、历史交汇的节点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、信仰与语言的交融,也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丰富性与包容性。在这里,我感受到不同民族的融合与碰撞,也感受到了文明的多样性与生命力。

我曾多次行走于中国的陆地边境线,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新疆的帕米尔高原,从内蒙古的草原到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,从原始的热带雨林到沙漠戈壁雪原,亲身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。

在这些边疆地区,我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,它们真实地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。这些故事值得被记录,更值得被讲述。我们不能忽视普通人的力量,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。通过讲述这些故事,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族的过去与未来,理解文明的延续与变迁,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。

在这些边疆地区,我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,它们真实地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。这些故事值得被记录,更值得被讲述。我们不能忽视普通人的力量,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。通过讲述这些故事,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族的过去与未来,理解文明的延续与变迁,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。

除了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时代命题,文学创作也应有“微观”的视角,关注那些被忽视、被遗忘的民间语言与地方传统。

语言,是文化的载体,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。然而,随着全球化的推进,许多语言正在逐渐消

失。如果不加以保护与传承,这些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也将随之湮灭。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山花慢火车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。这部作品以大凉山与成昆铁路为背景,通过半个世纪以来火车带来的变迁,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为了真实呈现时代之变,我通过实地调研、翻阅资料、调查走访等方式,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的民俗与生活方式的演进轨迹,真切感受乡村振兴背景下个体的命运沉浮与坚韧奋进。

此外,我还关注到了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,它不仅是庄子的诞生地,更是庄子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沃土。这里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孕育了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,但在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。

通过对地方文化的深入挖掘,我发现许多被遗忘的故事其实极具价值。这些故事不仅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地区,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体现。通过文学的形式,我们可以将这些故事重新唤醒,让更多人感受到它们的气息与脉搏。

在《山花慢火车》之后,我将继续创作另外两部长篇小说。这些作品既关注国家重大工程背后的科技力量,也聚焦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成长。它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: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,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?

文学创作的技巧固然重要,但它只是文学创作的表层,真正打动人心的,是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深度与人文关怀。从古代的神话传说,到现代的基建工程,中华民族始终展现出不断改变命运的勇气与智慧,中华民族始终在与自然对话、与时代同行。这些背后承载的民族精神,正是文学创作最宝贵的财富。通过文学作品,我们可以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,激励更多人勇敢面对挑战、追求理想。

文学创作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,它需要我们不断地观察、思考、探索与表达,而且对于更大的天地和未知的自己充满了无限渴望。文学创作的意义,就在于将这些“看不见的力量”转化为“看得见的故事”。在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交汇点上,让我们以更坚定的信念、更宽广的视野、更细腻的笔触,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。



鸭绿江